

龙旗飘扬的舰队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鸣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费中及卜内的与近队有并育面经时改所。且身以变

龙旗飘扬的舰队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 鸣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姜 鸣著

龙旗飘扬的舰队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孟霞

封面设计：姜 敏

龙 旗 飘 扬 的 舰 队

——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姜 鸣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淮海中路1984弄1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56毫米 1/32 插页4 印张15.5 字数372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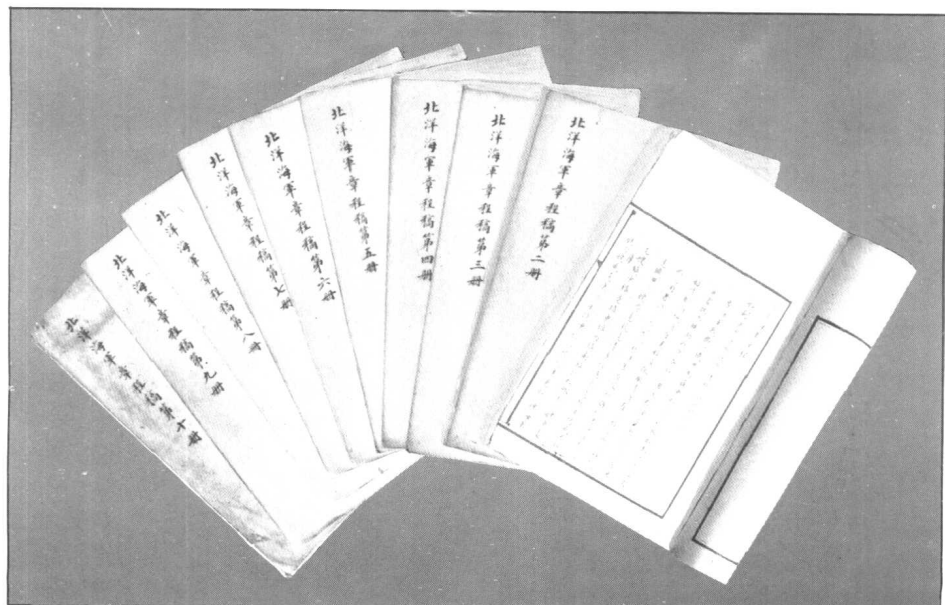
ISBN7-313-00857-0/K·06

沪目：235—77

定价：7.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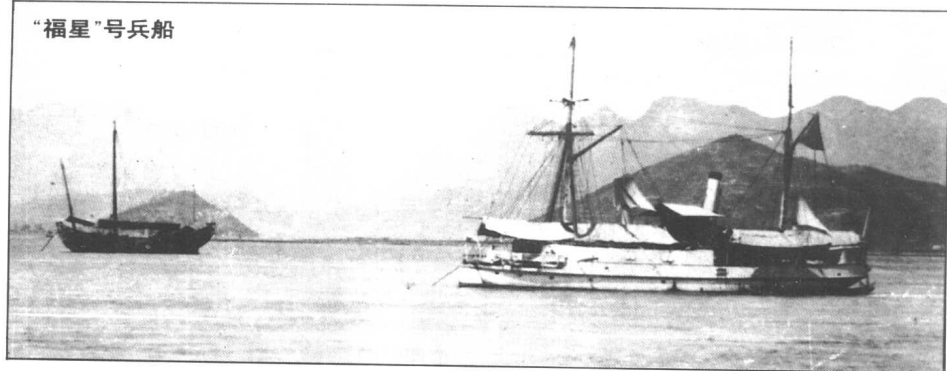


1886年，奕譞、李鸿章、善庆巡阅北洋海军时，在天津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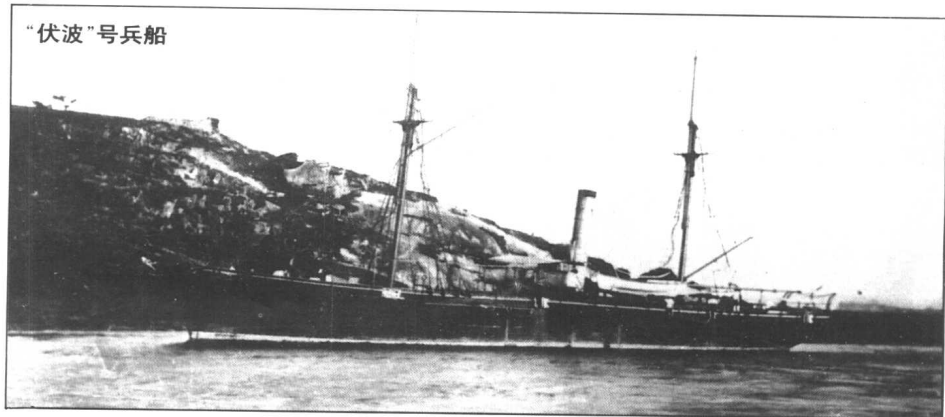


《北洋海军章程》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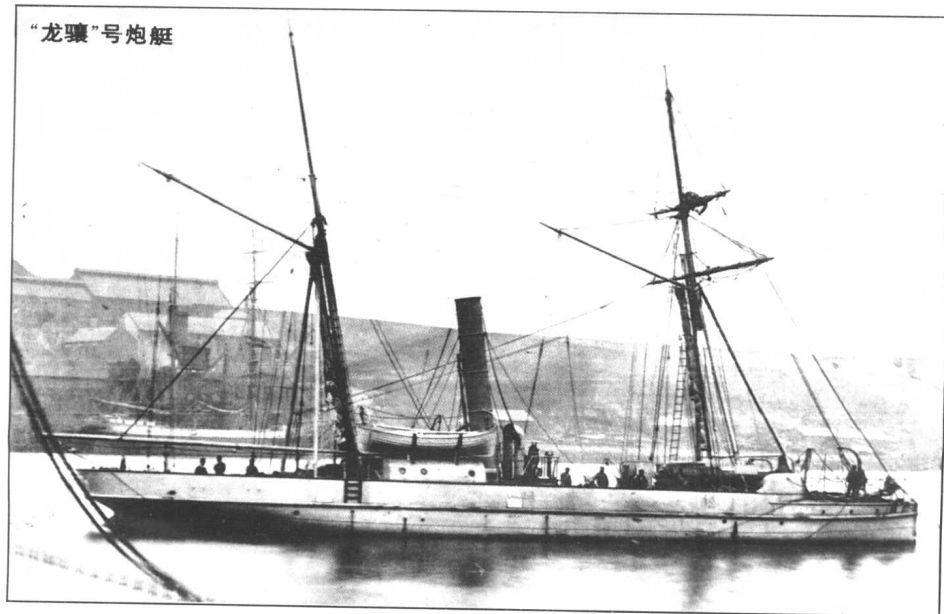
“福星”号兵船



“伏波”号兵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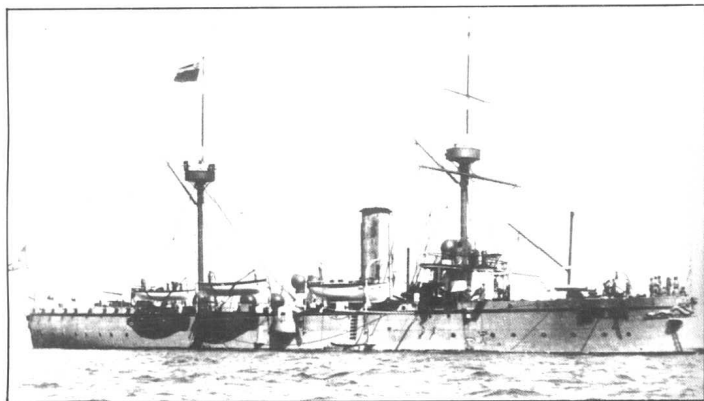


“龙骧”号炮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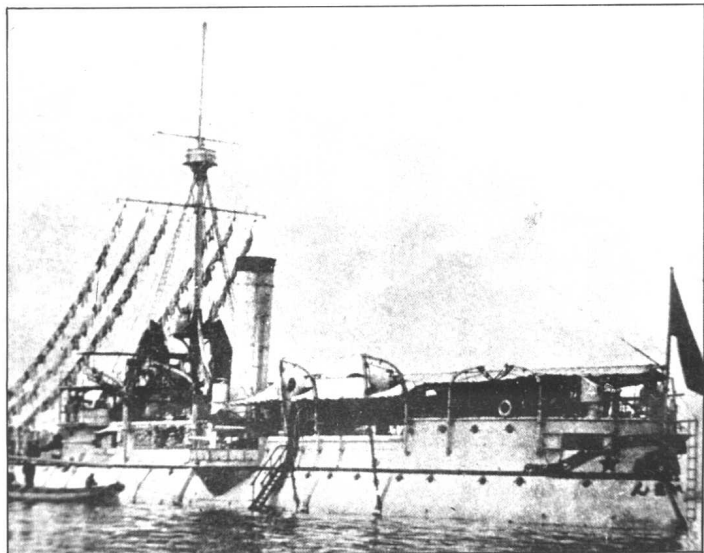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与人合作
考证复原的“定远”
号铁甲舰模型（现
陈列于北京中国军
事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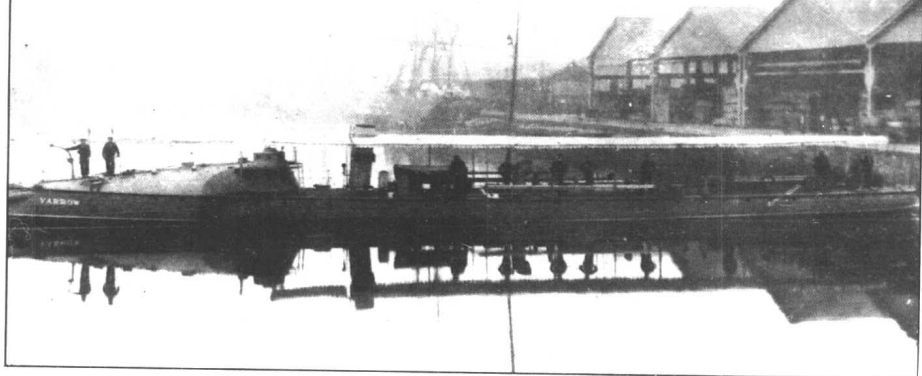


“致远”号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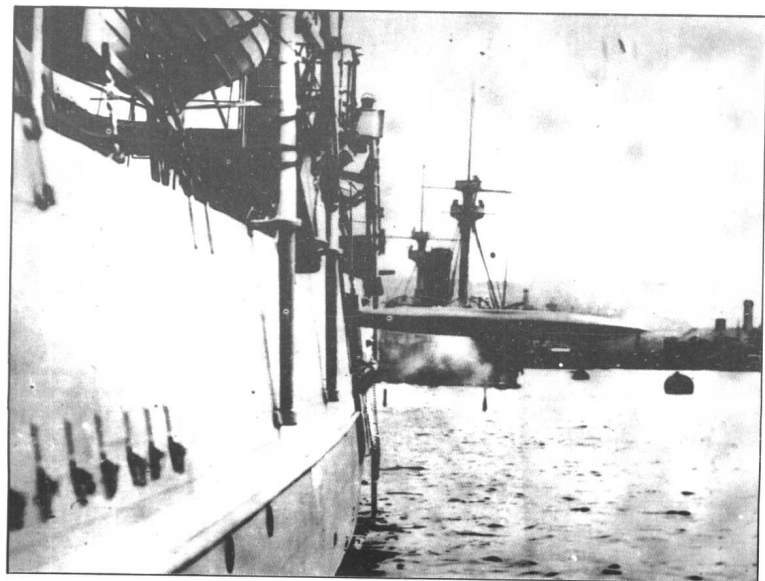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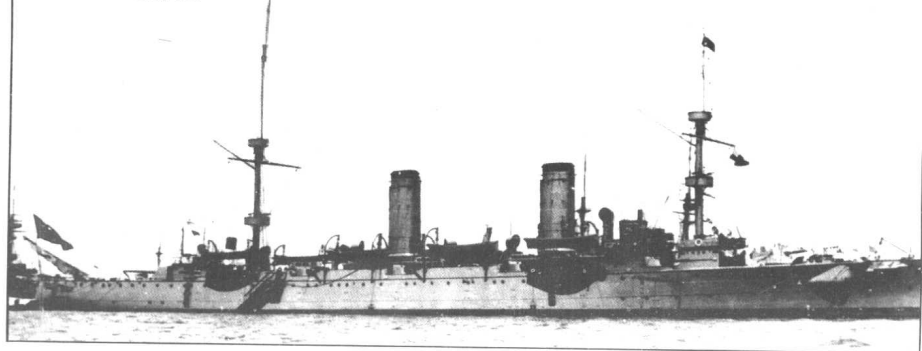


“平远”号巡洋舰

“左队一”号鱼雷艇



“海圻”号巡洋舰



“飞霆”号驱逐舰
在发射鱼雷

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令人瞩目的青年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孜孜求索，以年轻人特有的朝气，给学界带来了蓬勃生机。姜鸣同志是其中之一。

他从1981年起，在我指导下专攻中国近代海军史。十年耕耘，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军事史和船史研究界同仁的注意。本书是他关于海军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原拟作为我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丛书》的一种，后来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只好先单独出书了。

从一开始起，我们就议定了海军史研究的几项原则：既要着重考察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又要认真研究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关键性细节，避免使近代海军史写成不相继续的事件堆积；既要对近代海军的发展过程作动态研究，又需对有关海军建设的各项制度、船舰性能、军舰炮械、教育训练等作充分的静态研究，避免把近代海军史写成海战史；既要深入研究北洋海军，又应对南洋、福建、广东地区的海军发展状况进行勾稽考索，避免把近代海军史写成北洋舰队史；既要充分注意海军的军事使命，又要注意海军的政治使命与晚清政情的关系，把近代海军的发生发展放在清王朝国家战略的广阔背景中考察；既要纵向论述中国海军的兴衰，又要对中外海军

尤其是日本海军作横向比较研究，以确定中国海军的发展水平、特点和历史教训。我们认为这样才有可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翔实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中国近代海军史。

我高兴地看到姜鸣同志在本书中很好地实现了自己原定的目标。他对若干重大事件如马江之战、黄海之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又对某些细节如黄海海战中的接敌队形、中俄密约与维特回忆、颐和园经费等作了详细考证；对某些鲜为人知的问题如甲午战争期间的军舰贸易、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的内幕等，也根据中外史料进行了论述。在充分注意动态研究的同时，对诸如舰性能、海军章程与训练、海军教育制度等不少静态专题作了叙述与分析。他使用了清廷档案和奏稿，对南洋、福建、广东地区的海军作了迄今为止最翔实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存在三洋海军的见解。尽管这是一家之言，容可讨论，但他根据史料立说的态度是认真的。

作者的视野也较宽阔。在本书中，他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于中外海军的比较研究，从而对海防与塞防的大讨论、海军发展战略、晚清的清流政治等问题，都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观察与分析。虽然，分析中有时会夹杂一些太现代化的辞句而显得不够缜密，但年轻人在对历史进行反思时所特有的敏感，又常常使人嗟叹不已。

本书不仅以开阔的思路给人启迪，且因扎实的史料显示了作者的功力。为了写书，他常常废寝忘食地奔波于各个图书馆，辛勤搜集中外海军史料；做了数十万字的海军史大事记，每条记事都出自原始资料；解析海军史的重要问题，先做专题研究；钻研前辈和时贤的著作，咀嚼他们的写作技巧和文采，这几多辛劳的凝聚，才使本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深入浅出，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这本书的文字也很潇洒，文如其人，他自己确也是个颇为

潇洒的人。既做党务方面的工作，又搞历史研究，还经常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京华揽胜的历史散文，说古抚今，致使许多人以为他是一个熟知北京掌故、好发思古幽情的老夫子，其实，他至今只有三十挂四。以三十出头的青年人而能有这样的成绩，实在令人欣慰。

我决非因为是他的老师而尽说些好话，只是在目前知识贬值的不正常情况下，出于对像他那样一类青年学者有志于学术研究的感动，写些他的勤奋与立志，可以举一反三，看到其他已有成绩或正在努力的青年同志的辛劳。有这样一代青年，我们的学术界是大有希望的。他们当然还不很成熟，这部著作中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我不是在评书。我所想到的是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应该给他们以更多的指导、关心和支持。一颗好苗，只有在肥沃的土壤里，在充足的阳光、水分下，才能茁壮成长。木多成林，学术才能繁荣昌盛。当然，像姜鸣这类青年学者，也要更加自爱自重，才能在学界和社会的扶植下不断奋进，为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作为老师，对之有厚望焉。是为序。

沈渭滨

1991年4月于复旦大学

前 言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濒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有长达一万八千余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早在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在沿海地区生活了。为了同江河湖海搏斗，他们发明了舟楫。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水上作战的部队“舟师”。公元前485年，吴国和齐国在黄海进行了最早的海战。

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活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高峰。从1405年至1433年，宝船队远航三十余国，航迹到达印度洋和大西洋。宝船的排水量，据推测超过一万余吨。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返航，要比哥伦布抵达美洲早六十年。

中国本土位于温带至暖温带地区。绵亘于北方的戈壁荒漠和西伯利亚森林草原，逶迤西陲的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截断东西的澜沧江、怒江和横断山脉，使得华夏文明同西方文明隔绝开来，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区域。从大海到帕米尔高原，有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舞台可供先民们驰骋，足以抵销人口繁衍和外族入侵带来的种种压力。黄河、长江滋润着中下游平原，哺育出极为发达的农业文明。西太平洋成为天然屏障，既保护中国东都沿海不受外来民族的侵略，也阻碍了我们的祖先向东开拓的步伐。

孔子有一次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不过是偶尔发出的喟叹。在传统世界观中，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心。宋代有位士大夫说过：“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原王朝和四海邻国的关系就是如此。中原王朝对四海邻国实行王道教化，追求的理想是四野宾服、万方来朝。杜甫曾在诗中吟道：“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表达的正是既要抵御外来侵略，又不要无止境地开疆拓土的有限战略目标。总体说来，这种温顺平和的战略思想，反映了儒学的精髓。

海军的发展，是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相联系的。16世纪的英国探险家罗利说过：“能控制海洋的人便可控制世界贸易，而能控制世界贸易的人，便可控制陆地资源和陆地本身”。英国政治家克伦威尔更直言不讳地说：“炮舰是最好的大使。军舰最能显示一国的军力及对利益的关切。军舰可以采取主动或有利的行动……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提供这种机动和弹性。”这就把西方国家发展海军的政治、经济目的都说得十分明白。19世纪更是海洋的时代，尽管当时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尚未达到相当的程度，但通过海洋控制贸易、交通、战略要隘和陆地资源却显得十分重要。然而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国策的清政府几乎没有这种观念。我们重温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可以看到明成祖和明宣宗的指导思想，首先是树立大明帝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威信，宣敷教化于海外，以造成远邦重译而来、宾服中国的盛世景象；其次是察访明惠帝流亡海外的问题；第三才是进行朝贡贸易，为皇室和参加航海的官员获取经济利益。根据这些目标，中国海上力量前所未有地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度和凝聚力。可是，

郑和下西洋毕竟只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行动，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旦皇帝决定取消这一行动，整个航海事业便像昙花一现般很快萎谢。这同西方航海事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势力东来而欣欣向荣、久盛不衰的景象，恰成对照。

总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濒海的大陆民族，在它历史上有过一些航海的壮举，在航海器的研究上，也达到过相当水平。但从整个认识系统看，它对海洋的认识是保守的和有限的。广袤的生存空间，使它不必像岛国民族那样拼命去拓殖海外领土；丰饶的物产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使它无多大顾忌，除了奢侈品和香料外，几乎可以不依赖海外贸易；繁多的国内事务，更使它无暇顾及海外；而浩淼的大海，尤如天然鸿沟，有效地阻挡住外族入侵的可能性。由于中华帝国巨大的空间存在和华夏文化圈的辐射影响，在大多数年代里，海外邻国表示臣服和向化。于是皇帝和臣子们便沾沾自喜、高枕无忧了，他们何必再要去探险海外呢？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长期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奔驰的铁骑。直至明朝，海防才成为国家对外防御的重点。明朝从山东北部辽东都司（今辽东半岛）至广东南部的海南岛，设立了五十四个卫，一百二十七千户所，并在各险要之处筑城戍守。每千户所有十艘战船，每卫有五十艘战船，以期水陆配合，协同作战。明朝的海上之敌，主要是倭寇，后来还有荷兰殖民者。

清袭明制，继续设置水师。但在闭关政策指导下，水师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9世纪，便完全过时了。而西方的海军却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列强凭借着坚船利炮纵横三大洋，把一个个古老的封建帝国推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也用轰鸣的舰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无论从侵略还是从反侵略的角度看，从

来没有一个世纪，海军的作用显得如此突出。

近代中国的屈辱从海防的崩溃开始。为修补和缝缀破碎了的防线，便有了创办近代海军的历史活动。所谓近代海军，是指以蒸汽动力舰艇为主体，采用西式训练和作战方法，军官多经国内外海军院校培训，有完善后勤支援系统的新式海上武装力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近代海军的缔造者们——奕訢、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顺应历史的发展，继承“师夷长技”的主张，从1861年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把海军建设成整个清朝武装力量中初步完成向近代化转变的新军种。在中国近代军事改革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研究者把1895年开始的“小站练兵”看作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滥觞，其实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只是把军队近代化的重点从海军转移到陆军而已。袁世凯在“新建陆军”中追求的西式编队、西式装备、西式操典、西式教育、西式选拔征募制度和西式战术，海军在更早的时候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由于海军装备和军港基地的特殊性，因而使得近代化的规模显得更为宏大。

本书所述的近代海军是指清朝海军。它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861~1874年的初创阶段，1875~1884年的“南北洋并进”阶段，1885~1895年的“北洋独进”阶段和1895~1911年的重建阶段。选择1861年作为海军史的开端，是以“李-柯舰队事件”为标志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企图从国外购买军舰组建新式舰队，结果却被李泰国、阿思本等帝国主义分子搅得一塌糊涂，说明中国近代海军在发轫之初便历尽艰难。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清政府先后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显示近代海军同大工业密不可分。恰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在考察近代海军

的发展过程中，笔者始终把近代造船工业的发育作为同时关注的线索，这也正是近代海军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1867年，担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首先提出建立“三洋水师”的方案。1870年，在自制舰船的基础上，福建设立“轮船统领”。从此，按区域组建舰队以完成海军近代化的构想一直成为19世纪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主线。只是在如何发展区域海军的认识上，出现了许多激烈的争辩。经过1874年的海防大筹议，确立了南北洋同步发展的战略，构成海军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法战争后，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领导全国的海防建设，并确立先练北洋海军的战略，构成近代海军发展最为辉煌的阶段。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海军衙门被裁撤。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20世纪初，海军开始了缓慢的复兴，直至辛亥革命易帜。

四个阶段的交接点，是三场对外民族战争，即1874年抵御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投入了相当的海军力量。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都有大规模的海战。尤其在中日战争中，出现了迄至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蒸汽军舰主力决战和要塞防御战，从而使中国近代军事史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前两场战争刺激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第三场战争却毁灭了海军菁华。总结这些战争，对于海军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

早在1874年，郭嵩焘便提出了他的疑惑：“诚使竭中国之

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覬觐，亦何憚而不为之？而……果足恃否，此所不敢知也！”他尖锐地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这种把海防建设同改造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观点，整整超越了时代二十年。其他洋务思想家和官员，一下子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实践，也开始考虑海防同国家战略的关系，提出把海防力量的振兴同航海、对外贸易、侨民管理事业结合起来，要从国家战略的宏观高度上来讨论海防。可是，这只是闪烁的流火，瞬即消逝在茫茫的夜空。无论是对于发展国家的海上综合力量，还是加强同侨民的联系以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清政府都没有作过认真考虑，始终把海军建设仅仅看成是保卫本土海岸线及港口要塞的辅助力量。没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论，没有深入思考过海军的使命。直至清朝覆灭为止，中国舰队总体上是一支“绿水”舰队。可以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需要强大的海军，不需要拥有将利用海洋和保卫国家利益综合于一体的海上力量。因此，发展海军事业必然缺乏内在动力。虽然在一个时期内，鼓吹海防的言论可以遍及朝野，海军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清政府绝不会像德国、日本、美国那样，倾国力去建设海军，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为海军强国。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保卫海防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

四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于近代海军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三个专题内，没有形成海军史